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出笼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改组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平津后，侵华日军就派板垣师团进攻南口。打开南口后，继续向张家口进兵。日本关东军又派出酒井机械化部队，通过多伦、张北等地进攻张家口。这时，我和李守信也纠合伪蒙古军的主力，先占领了化德，接着即配合日军向西进犯。在两路日军分进合击及伪蒙古军的配合下，于8月29日占领了张家口。先由于品卿、杜运宇等组成“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与板垣征四郎会见，接着又集中两路日军向西进犯，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先由夏恭、马永魁等组织“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

板垣师团占领大同后，即南向进攻山西太原，酒井部队则进攻绥远。这时伪蒙古军集中主力在平绥路配合日军作战，并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陶林、武川。伪蒙古军全系骑兵，往往走在日军前面，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前驱。在日、蒙军配合进攻下，10月14日占领了绥远省城归绥，10月17日占领了包头。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德古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等，也由张北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旧绥远城。

这时，我正在百灵庙组织伪盟旗联合军进占武川，企图为进

占归绥卖力。旋接到吴鹤龄和陶克陶等来电，催我赴绥，商洽“建国”大计等重要问题，并说“万勿因小而失大”，即派飞机来接。我即以“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委派随从人员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并发布了安民布告，然后乘飞机到绥。

经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决定于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伪政权问题。确定通知参加的人员是：1. 各市、旗、县民众代表一名；2. 各旗札萨克或总管；3. 各伪市、县长；4. 经许可之地方代表和团体代表；5. 各盟长、副盟长；6. 伪蒙古军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副长、各师长、各处长；7. 驻外代表；8. 伪蒙古军政府主席、副主席、总裁、主任、部长及各署长把召集开会通知以伪蒙古军政府名义发出后，一面组织第二次“蒙古大会”筹备会，由特克希卜彦负责进行筹备。一面由我和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等与日本方面商洽成立伪政权问题。迨至锡、察两盟“代表”到达后，我们就提出“蒙古独立建国”问题，请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和伪蒙古军政府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村谷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问题，关系重大，牵涉到国际上《九国公约》问题，需要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慎重研究，一时不能确定。”我和各盟旗“代表”们又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既经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田中隆吉参谋也早有帮助的诺言，这次田中隆吉到达张北，也曾为此问题，向驻大同的东条参谋长请示，据说俟攻占绥远后，就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现在已经攻占绥远省城，而蒙古建国反倒成了问题，我们身为盟旗的代表，还在此地做什么，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急切地答复说：“你们这样说，不是连关东军的话都不听了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当时我认为村谷彦治郎和桑原特务机关长职位不高，对于

“蒙古建国”这样的大问题，自然不敢提出什么主张，因而我曾和日本驻在归绥的部队长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帮助。我向他说：“蒙古建国是田中隆吉的诺言，为什么现在又不算数呢？”酒井隆答复我说：“田中隆吉这个人非常冒失，他主持进攻绥东时，我正在天津，曾去信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受失败。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他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嗣后，我又和吴鹤龄等研究，认为“蒙古独立建国”既然一时不能实现，即可以“蒙古军政府”作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的政权。理由是：蒙古原有领土还未完全“恢复”（伊盟尚未沦陷），现在仍是军事时期，所以提出仍以“蒙古军政府”为政权机构比较合适。经和日本方面商量，仍然不同意，授意我们成立与察南、晋北相同的伪政权。

我又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吴鹤龄说：“我们就组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吧，因为我们现有几个盟，是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意思。我总觉得，田中隆吉说的‘蒙古自治联盟’很别扭，不如反转过来叫‘蒙古联盟自治’较为通顺。”我同意了吴鹤龄的说法，就责成他拟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院，管理政务，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管理军事。拟好后交由桑原和村谷等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

嗣后即接到日本关东军的电报通知，表示同意，但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并指定我为伪政务院长，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看过之后向我说：“日本关东军这种做法，是居心挑拨。人事安排，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决定，

可是他们却越俎代庖，先为指定了。并且在‘蒙古军政府’时期，你是总司令，李守信是副司令，这次日本关东军却指定李守信为总司令，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但也不好再变动。假如不照关东军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满。”接着他又说，“主席一职本应由你担任，但必须云王（云端楚克）表示不就，才为妥当。要不我去面见云王，劝他自动让出主席一职，推崇他为元老，你看怎样？”我当即答复说：“云王年高望重，仍宜推为首席，我当政务院长就行了。”我说这话不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仍以云王任伪主席为宜。因为这样既便于号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日本关东军的意旨，但实权仍归我掌握，云王不过徒拥虚名。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利无害的事情。并为了避免内部发生矛盾，也就依照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内定李守信为总司令。

这样商定之后，各地代表均已到齐。计锡盟参加者：伪副盟长林沁旺都特、札萨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布达巴拉、巴拉贡苏隆、多不丹等；察盟参加者有：伪盟长卓特巴札普、总管达密林苏龙、色楞那木济勒、诺尔布札那等；乌盟参加者有：伪副盟长巴宝多尔济、沙拉巴多尔济、德瓦根敦、拉希色楞、额尔克道尔吉朗等；土默特旗代表有：亢仁（默尔根巴图尔）、森额等；伪蒙古军政府参加者有：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特克希卜彦，吉尔嘎朗、乌勒吉图（张秉智）、超克拨都尔（陈绍武）等；伪蒙古军参加者：李守信、乌古廷、刘星寒、刘继广、尹宝山、王振华、宝贵廷、依恒额（伊给先）、萨音巴雅尔（包悦卿）、仓都固仍（包海明）、札青札布（戴选青）、阿尔弼吉呼（张启祥）、崔宇堃、崔景岚、纪树勋、卓里克图（关荫南）等；地方团体代表参加者计有：贺秉温、李春秀、贺云章等；各伪市、县长参加者计有：刘连升、徐荣侯、亢锦荣等；“蒙古旅平

‘同乡会’则有赵那苏图（赵汇川）、李丹山、桑宝（包维翰）组织代表团前来，祝贺第二次“蒙古大会”的召开并慰问军政人员；“外宾”参加者有：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满驻蒙代表玉春、伪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田汝弼等。遂即召开预备会议，推选我和云王、沙王（沙克都尔札布）、李守信、补英达赖、卓特巴札普、林沁旺都特、巴宝多尔济、吴鹤龄等为主席团主席，特克希卜彦为大会秘书长。

当提出沙王为主席团主席时，卓特巴札普还提出异议说：“沙王没有来，为什么还选他为主席团主席呢？”吴鹤龄当即答复说：“已经派飞机接去了，很快就会到来。”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迨飞机返回后，沙王仅派一个什么事也主不了的代表来了，吴鹤龄带着抱怨口气说：“沙王怎么没来呢？这里正等着他。”尽管沙王没有躬亲参加，仍然选他为主席团主席。意在利用他的名义，拉拢伊盟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主席团虽已选出，大会亟待开幕，但伪主席一职还未作最后确定，是否设置副主席一职也未得到解决。经和桑原中佐及村谷彦治郎商量，他们则以官小职微，不敢决定，允向关东军请示。一直到 1937 年 10 月 28 日，开会的那天上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才乘飞机赶来参加。下机后与欢迎人员略作寒暄。桑原、村谷、吴鹤龄、陶克陶等，即迫不及待地向东条征询关于内定谁为主席及是否设置副主席的意见。东条答复说：“内定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就行了吧。”于是酝酿多日颇费踌躇的谁当伪主席、副主席问题，经过东条英机淡淡的一语就解决了。这充分说明，云王的主席和我的副主席是日本关东军一个参谋长加封的，通过大会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我们把东条英机让至大会堂休息室略事休息后，即举行开幕式。先由我致开幕词，说明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的意义。继

由“贵宾”东条英机、于品卿、田汝弼、玉春等致祝词。所有“祝词”无非是“日蒙亲善”、“满蒙合作”、“民族协和”、“共存共荣”等语。接着讨论的议题是：通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成立宣言。经用蒙、日、汉语宣读后，无异议通过了。下午的议事日程主要是，推选主席和副主席。由李守信提议，推选云王为主席，我为副主席，立即征询大家的意见，与会代表默不作声，也就宣布无异议通过了。接着通过对于日本和伪满发出感谢电，并对来宾和文官科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人员授予纪念章。因云王有病未参加，我即当众宣誓就职，大会就告结束。当日在大观园设宴演戏，表示庆祝。兹将大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录后：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第一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及副主席由蒙古大会就蒙古德高望重、有大勋劳于蒙古复兴运动者选任之。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主席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

第二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浩特市（按：即呼和浩特市）及包头市为统治区域。

第三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第四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仍旧使用前蒙古军政府之旗章。

第五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应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但

使用旧历。

第六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于厚和浩特。

第七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地方之权限，依均权之原则，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另定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蒙古是有土地、有人民、有组织之民族，有创立元朝伟大光荣之历史。迨至明代，虽然退居朔漠，尚且保持均衡之地位。清初更援兵诸部，兄弟封藩，其固有之土地、人民、主权，毫未损失。及至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民秉性纯厚，相信待遇平等，竭诚拥护，矢志弗渝。但二十余年来，竟视我蒙为外藩，设置省县，土地瓜分净尽，党政专横，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民之生计日趋贫穷，盟旗之权限日趋凋零。生存几至无望，尚何平等之有！因而群情激愤，不避水火，一致奋起要求高度自治，延续一线仅存之命脉。几经呼吁奔走，获得百灵庙蒙政会之自治。明虽允准，暗实切恨，阳藉扶助之名，阴运摧残之机，军阀之暴敛如故，疆吏之挑拨日甚，或则大军压境，张出席卷之威，或则经济封锁，迫近灭亡之路，类此荼毒事实，实属罄竹难书。二十余年之竭诚拥护，只得到歧视与压迫，设如依此推移，蒙古将何以生存！且自中国革命以来，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人民涂炭，百业凋敝。近更外交失策，国事日非，启衅邻邦，仍复分据疆土，骨肉相残，何暇顾及边疆。我等念祖宗之伟业，为民族之生存，不能垂手待毙，自贻伊戚。因于去春在西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并编练蒙古军，外防共产，内安生民，一载以还，规模渐具。今秋中

日失和，疆吏乘机谋我，当为防卫计，不得不整军经武，幸赖全体将士之用命，庆得友邦义军之援助，仅及数月，得以收回长城以北之故土，此实天予苏生之良机，言念及此，不胜欢欣。从而奋然兴起，勇往迈进，力图更生，特召集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在绥远城举行第二次蒙古大会。经大会决议：本太祖成吉思汗民族融洽、一致合作之精神，即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疆土为领域，以严防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本互惠互助、共存共荣之精神，敦睦友邦，以期确立东亚和平，实现伟大理想。推选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负责组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特此宣言，以昭大义。凡我全体官兵及将士，希一致拥护，体现我蒙为国家为民族之至情，贡献人类之和平，不仅蒙古之荣幸，抑亦全世界之光辉，天人共鉴，矢志勿渝。

第二次“蒙古大会”结束后，即派员修葺绥远省政府旧址，作为“政府”厅舍。但因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未经关东军确定，迁延达一月之久，还未组织起来。我曾去找桑原特务机关长，请他催促关东军速为确定，桑原说：“我已催促了，迄今尚未答复。”并把给关东军的电报给我看，证明他已经催促过。我虽然非常着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待，并嘱桑原再行催促。结果还是等候了多日，日本关东军才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核定下来。规定是：政务院长负责制，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与伪政务院平行机构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会。于是我就按照这个组织法着手安排主要人事，除依照日本关东军意旨以主席名义任命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

外，并任命吴鹤龄为伪参议会议长，陶克陶为伪总务部长，下设总务、内务、教育、外交各处，总务处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内务处长李丹山，教育处长陶克托胡（陶布新），外交处长赵那苏图。发表吉尔嘎朗为伪财政部部长，下设会计、税务两处，会计处长乌勒吉图（张秉智），税务处长巴雅尔（吴相文）。发表特克希卜彦为伪保安部部长，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长昌都冷，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关荫南）。专为主席办事的有秘书处，由赛吉尔胡（丁我愚）任处长。并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因在张家口搞“蒙疆联合委员会”，始终未到任，由次席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负实际责任。总务顾问是中岛万藏，财政顾问是栉部正晖，保安顾问是大园长喜。另外还设有一个伪司法局，任刘永誉为局长。这是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安排。

1938年3月24日，云王因病逝世，搞了一个遗嘱如次：

“余幼时即以民族复兴为职志，虽年老体衰，努力民族自强，不敢稍懈。不幸为病魔所缠，竟自不起。我政府副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切切铭记，协同全体民众，向敦睦邦交，民族复兴迈进，切望完成建国大业，特此遗嘱。”

这个遗嘱原文是蒙文，我特为云王举行奉安典礼，发动各机关团体备花圈、挽幛，前来祭奠。我亲为执紼，并以“吾将何之”四字为挽，率领文武官员公祭。伪满皇帝溥仪特别题赐“世笃忠诚”四字，青年职员们很不满意，认为这仍是以臣属之礼对待“云故主席”。我为了敦睦“蒙满邦交”，还是主张悬挂起来，表示尊重。

为选举继任伪主席，特于是年7月1日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推选我为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我特发表就职宣言如次：

“本副主席受大会之推选，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自知德

薄能鲜，深恐不堪胜任，惟有继承太祖成吉思汗之伟大精神，遵奉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依据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基本方针与生、聚、教、兴、养、卫六大施政纲领，不辞艰苦，努力以赴。冀望友邦各国及各政府，以互惠互让、共存共荣之精神，赐予指导协助。全体官民将士，须一致团结，同心协力，完成复兴大业，实现东亚和平。海枯石烂，宿志不移，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我继任伪主席后，深感伪政务院的三部组织较小，认为应当扩大和加强，使之具有“国家”组织形态。日本帝国主义则为了适应战时体制，搜刮战略物资，加强控制各项工作，认为更有进行机构改革的必要。因此即于是年 8 月 1 日实行机构改革，改革的原则和办法是：1. 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三部制，实行一厅四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四部制。总务厅主管总务、企划、主计、人事、外交等工作，为一切行政机构的中枢，就是采取总务中心主义，以期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纵的统治和横的联系。2. 网罗对“蒙古运动有功劳者”及汉族有代表性的人士，组织“政务委员会”，作为伪主席的咨询机关，以资调整蒙汉关系，沟通各方意见。3. 废除盟公署的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四厅制，改设一个官房和民政、畜产、保安三厅制，以明确施政重点，密切“政府”与盟、盟与盟之间的联络。4. 将“巴彦县”（即过去归绥县）合并于“厚和”市，并将“厚和”市升格为特别市，以便逐渐发展为国际都市的“新兴首都”，作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5. 各县配备以纯蒙古族人编成的保安队，负确保治安的责任，确定军、警责任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改革后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要人事阵容如下：我任伪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任伪副主席兼伪总司令；秘书处处长仍为赛吉尔胡。伪政务院下的总务厅长为陶克陶，下设

五个处，总务处长仍为图木勒巴塔尔，人事处处长乌勒吉图，主计处处长霍克济胡（霍翰甫），企划处处长金谷勒模（金养浩），外交处处长仍为赵那苏图。伪民政部部长特克希卜彦，下设内务、教育、建设三个处，内务处处长札拉戈穆济（白景畲），教育处处长仍为陶克托胡，建设处处长恩和阿木尔（张绍庭）。伪财政部部长仍为吉尔嘎朗，下设两处，理财处处长李丹山，税务处处长仍为巴雅尔。伪保安部部长换了雄诺都布，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处长仍为昌都冷，司法处处长仍为卓里克图。伪畜产部部长郭尔卓尔札布（郭王），下设牧业、畜产两处，牧业处处长哈斯瓦齐尔（肖佩玉），畜产处处长米济道尔吉（黄葆庆）。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没有发表局长，由顾问黑泽隆世代行职务。伪司法局长仍为刘永誉。“驻满代表”金永昌，因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继任代表为恩和布林（吴恩和）。伪参议会议长仍为吴鹤龄，派往日本留学。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与设施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为了巩固我的统治权，在内政上、军事上、文教上也有些变革和设施。我总觉得取得盟旗王公的拥护和伪蒙古军的支持，是我的政治资本。因此，特别侧重盟旗行政的加强。至于汉人居多的各县，日本人把持得很紧，我想管也管不了，干脆就任凭日本人摆布。我在盟旗内政上的设施，首先是设置伪巴彦塔拉盟（巴彦塔拉是富饶平原的意思），管辖的区域计有土默特、正红、正黄、镶红、镶蓝五旗及“巴彦”（即归绥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凉城等县，包括旧绥远省政府所统辖的大部地区，是五盟中人口和收入最多的一盟。补英达赖自被解除伪蒙古军政府

办公厅主任后，本是满腹牢骚，伪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立后，我任命他为盟长，才心满意足，不发牢骚了。伪巴盟的主任顾问开始时是安宅，后为泽井铁马。伪盟署下设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发表超克拨都尔（陈绍武）为总务厅长、贺云章为民政厅长、李树声为财政厅长、李春秀为教育厅长。嗣于 1938 年秋实行机构改革，又改设伪官房和民政、保安、劝业三厅，调任贺云章为官房主任，超克拨都尔为民政厅长，默尔根巴图尔为保安厅长，李树声为劝业厅长，调李春秀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参议会参议。

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我曾想采用蒙汉分开的办法来统治。具体就是说：以铁道为界，居住在铁道以南的蒙民，移至铁道以北，居住在铁道以北的汉民，移至铁道以南。经和补英达赖、默尔根巴图尔等商量，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办理，是叫蒙汉民众大搬家，牵涉面广，困难甚多，不易办到，甚至还可能引起蒙汉人民的反感。因此我才没有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结果还是沿用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政策。例如土默特旗和“巴彦”等县所统辖的区域，是蒙汉杂居，其中的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对于察西四旗和集宁、丰镇等县，也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来统治蒙汉人民。至于各县、市伪县、市长，大多数是任用汉人，除了蒙人韩绍祖当过萨县县长外，其他各县均由汉人中的绅士之流充任。如伪“巴彦”县县长亢锦荣、伪集宁县县长张书常就是一例。这是为了拉拢汉族上层人物，调整民族关系，起到巩固伪蒙政权的作用。至于各旗总管，当然都是任用蒙人，例如土默特旗总管先是亢仁，后为森额，察西四旗总管都是留用旧人，为的是驾轻就熟，便于统治。

其次是设立伪厚和、包头两市，由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辖。自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府后，就把归化和绥远这两个名称取

消，改为“厚和豪特”，并建立为市，作为伪蒙政府所在地，发表贺秉温为伪市长，是酬劳他在日蒙军占领绥远时出面“维持治安”的“功劳”，也是想通过他笼络商民，拥护伪蒙政权。奈因他发财心切，仍愿继续做鸦片买卖，把他调任为“土药公司”理事，由李春秀继续任伪市长。也是想通过李春秀这个老官僚，拉拢满汉人士，拥护伪蒙政权。嗣因“厚和市”是伪蒙政府所在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将其升格为特别市，并把“巴彦县”撤销，将其所属地方归“厚和市”管辖，扩大伪“厚和市”的统治区域。至于包头设市的原因，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上的需要，不过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与设市有关。因为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黄河水运的渡口，为皮毛百货的集散地，而且是军事上的前哨，日蒙军集中驻地。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搜刮战略物资，掌握经济命脉，供应军队所需，更愿加强包头的行政组织。因此，特设包头市，任命刘继广为伪市长。

第三是加强各盟行政机构。盟在清朝时期本是各旗“会盟”的地方，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虽制定过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也迄未施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伪察盟公署早已设立确定为行政组织外，对于锡、乌两盟也确定为行政单位，在贝子庙（现锡林浩特）设立伪锡盟公署，我仍兼盟长，任命林沁旺都特为副盟长，中村浅吉为主任顾问，下设伪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蒙汉兼通的玛哈希力（赵文儒）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仍为原来十旗。在百灵庙设立伪乌盟公署，任命巴宝多尔济为盟长，沙拉巴多尔济为副盟长，山本信亲为主任顾问，下亦设伪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墨尔根巴图尔（宝道新）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除原有六旗外，又增加了

一个固阳县。至于伊盟地区虽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统治领域，但未被日军占领，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在伪蒙联盟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伊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齐尔（阿王）派员前来和我联络，探询他是否可以来，我答复说：“请阿王自己考虑吧，这时如来我当然欢迎，如果脱身不便，暂时不来也可以，反正迟早是要收复伊盟的。”当时我固然愿意早日占领伊盟。日军为了向西扩张侵略势力，进犯伊盟更是心切，因此特派伪蒙古军的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们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往杭锦旗迎接阿王。阿王是做官心切的人，为了急于得到伊盟伪盟长的地位，即于 1938 年春初前来。我当时发表他为伊盟副盟长代行盟长职务，黑泽隆世为主任顾问，暂在包头成立伪伊盟公署，下设伪总务、民政、保安各厅，除总务保安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为厅长外，特派我的得力干部吉尔格朗（吉致祥）为民政厅长。发表奇子祥为准格尔旗西协理代行札萨克职务，章巴多尔吉（章景文）为达拉特旗的札萨克。日本方面又拉拢了达拉特旗的保商团长森盖林庆，发表其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企图通过阿王等人，策动伊盟其他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第四，在内政设施上，我到达绥远城建立伪蒙政府后，曾经幻想，日方既然表示“帮助”蒙古，必然帮助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很想把绥远旧毛织厂接收过来，预备叫贺文章为经理，把原有工科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恢复起来，用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不意占领绥远不久，日本军就把旧绥远毛织厂拨归“满铁”会社经营，并将旧工科学校的机器也都拆卸给了毛织厂，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本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我曾提出交涉，日本方面总是闪烁其辞，不作明确答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具体到内蒙古，更是要

把内蒙古作为供应原料、销纳商品的殖民地。因而绝不允许恢复工科学校，培养工业人才。至于产业、金融、交通事业，都归“蒙疆联合委员会”直接掌握，分别交由日本企业机构经营。例如平绥铁路就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直接经营。

在文化教育上，我是侧重蒙人教育。为了培养急需“人才”，特就大台什村旧有的农科学校原址，设立“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札布为院长。郭调任伪畜产部长后，由金永昌继任院长，由那苏图（王庆三）任教导主任，吾勒吉卜林任事务主任。在专业设置上计有旗务、师资、师范、电报、补习各班，我特亲笔书写“勤敬忠诚”四字为“院训”，有时还到该院亲临“训话”，希望在院的青年学生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供我驱使。并在市内大会堂后边设立“蒙古文化馆”，任命伊德钦为馆长，吸收地方绅士郭象仪等为馆员，分设总务研究、图书、印刷各组，进行编纂小学教科书、课外读物、发行文化专刊等工作。我为了训练王公子弟，又特设一个蒙族学校，由伪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兼校长，调任超克曼度夫（汪文林）为教导主任。由伪保安部筹设中央警察学校一所，任萨彦毕勒格图（陈靖震）为主事，训练警官和警务人员。为了培养通晓日文的各项“人才”，选送蒙古留日生十名，下令锡、乌两盟各设蒙古青年学校一所，责令各旗一律设立小学一所，卫生所一处，一律设置无线电台，加强通讯联络。

第五，在军事上，我也知道充实武装力量是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对于各旗保安队发给新枪，充实装备，并派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充任教官，从事训练工作，居中掌握官兵，希望对我能起拥护的作用。对于伪蒙古军方面，我虽然放弃了总司令，改由李守信继任，但我认为伪蒙古军还是我的政治资本，

故不惜增加蒙民负担，为之征兵买马，总是力图扩充，不愿缩小编制。记得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末期，日本方面主张将“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把“蒙古军”由汉族人编成的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驻在各县的警察队，我很不以为然，认为第一、二、三师虽然多数是由汉族人编成的，各师军官均与李守信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绥东战役和占领绥远各县的行动上，曾出过很大的力气，多数都效忠于我，其中背叛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提出反对。但因日方持之甚坚，争执无效，也就只好如此。日方把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靖安警备队，设两个集团，第一集团长为郭光举，第二集团长为门树槐，集团之下设大队、中队和分队。这个警备队，完全部署在后方汉民居多的各县，用以镇压汉族人民，而把由蒙古族人编成的第四、五、六、七、八、九各师，则改称为某某部队，多部署在包头、百灵庙及锡、乌两盟的边境地带，配合日军防止国民党的反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1938年春，傅作义率部突然打到一间房一带，距离“厚和市”很近。这时驻在凉城的伪蒙古军第三师团长慕兴亚背叛我归降傅作义，以致谣言纷起，人心恐慌。我为安定社会秩序，收买人心起见，亲在小校场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强调在此春夏之交，农作物正在生长时期，傅作义军竟不惜踏毁庄稼，糟害青苗，突来进行扰乱。我是想用这样挑拨性的言辞，引起当地人民对傅作义的反感，转而拥护伪蒙政权。我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话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飘扬在讲台前的蒙古旗撕成两半，我当时迷信地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蒙古政权要垮台。幸而为时不久，傅作义军就撤退了，这才又转危为安。

第六，对于汉民居多的各县，日本人虽然抓得很紧，不叫我管，但是对于能够收买人心的事情，还是想过问。例如日本人在

各县城镇地方设立的赌博性质的俱乐部，为地方公正人士所反对，因此，我曾下令取缔俱乐部。但是各县日本顾问总是不理会，当然我的命令也不发生作用，不过我却因此博得了一些人的奉承。在 1938 年夏天的时候，久旱不雨，我特到“厚和豪特”舍力图召焚香祈雨，表示关心民疾，用以收买人心。

旧阴谋 新花样——我向日本要权未遂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内，我向日本要权，也有过几次“冲突”。原因是我虽说当了傀儡，还想掌握伪蒙政府的军政大权，实现我统治蒙古的野心。日本方面自然是把我这个傀儡当做他们侵略蒙古的招牌，要我俯首贴耳地听从他们的指挥。因此，我便和驻在内蒙古的日本军部和当权的日本政客发生过几次“冲突”。首先是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问题上，引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固然是日本侵略军起了主要作用，但配合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我的伪蒙古军，因全系骑兵，行动迅速，往往走在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前面，假如不是日本军部阻止前进，等候日本部队，很可能先行到达。例如我在百灵庙组织“各盟旗联合军”攻打武川，和当地守军井得泉（原系伪蒙古军的团长，在“七七”事变后投归傅作义军）部队接触时，由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生道毅德尼玛等率队冲锋，当时被击毙，因而后退。我又命令伪蒙古军第九师从陶林进兵，准备再次攻打武川。迨至仓都固仍（包海明）率队到达后，听说井得泉已准备撤退，武川业已垂手可得。我计划拿下武川，即进攻绥远。不意这时桑原特务机关长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让驻在百灵庙的军事顾问山内转告我说：“现在占领凉城的日本军，正向绥远开拔，候日本军到达后，再行攻打绥远，较为稳妥。务必阻止第九师前

进，以免孤军深入，而冒危险。”并且说“蒙古军已经作战很累，应当休息”。桑原这些话，虽然说得很好听，似对伪蒙古军关心，不叫受到损失，实际上这时绥远各地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业已调往山西，其他正规部队多已撤离绥远，仅留国民兵等地方团队维持局面，这种情况当为日本军部所侦知。因为绥远城很易拿下，因此日本方面计划叫日本军率先入城，不愿叫伪蒙古军先行到达，所以特来阻止伪蒙古军进攻。当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主力到达平地泉，第八师师长长青札布和第九师师长仓都仍率领伪蒙古军到达陶林时，日本军部也是严令停止前进，让等候日本军到达再行进攻。根据以上情况，我和包海明等曾向人夸说伪蒙古军的“勇敢”，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立功很大。不意这话竟引起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的不满，说我有意抹杀日本“皇军”的“战绩”。记得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大桥忠一到北平，嗾使吴佩孚出山，后便窜到“厚和市”视察情况，前来看我时说：“我这次到北平，是专为做吴佩孚的工作，顺便前来看看你这老朋友。”我问他：“你工作的怎样！”他答说：“不行！吴佩孚比你还硬，要的条件太高，如果他要出来主持华北局面，要求日本军全部撤退。这个条件怎能接受。”接着他又向我买好说：“我在军部听说，你在占领绥远城等地时，称赞蒙古军的‘功劳’，军部却认为你有意抹杀‘皇军’的‘战绩’，对你很不满意。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劝你，不要和军部起摩擦，因为你和军部摩擦，是对你不利的。你如对军部不满意时，可到日本国内呆一个时期。”由此可见，我指挥伪蒙古军进攻陶林、武川、绥远城等地，固然为了实现我的政治野心，其实本来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气，做日本帝国主义西犯的马前卒，不想因为夸说伪蒙古军的“功劳”，竟惹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和猜忌。这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也说明，充当日本帝国主

义统治下的伪蒙政府主席，只有看日本军部的脸色行事才行。

其他几次“冲突”是：

一、当日“蒙”军联合西犯时，由伪察盟安宅顾问组织“政治接收班”，随军前进，委派伪县长，恢复地方秩序，出安民布告等。例如集宁、丰镇、归绥、包头等伪县、市长，都是由安宅率领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的。伪蒙古军政府虽然也组织两个随军工作班，一个是由陶克陶等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到达张家口，沿着平绥路随军前进，做“宣抚”工作。一个是由郭尔卓尔札布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经化德、苏尼特右旗、锡拉木伦庙等地到百灵庙，接收武川，做“宣抚”工作。不想我以伪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却引起安宅顾问的不满。他说这是他所率领的“政治接收班”的职权，我委派县长不应当。好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有把徐荣侯更换。

二、在伪蒙古联盟政府成立后，日本宪兵队竟把设在“政府”后院的直属电台的报务员葛孟库、陈寿山二人逮捕。我听后很恼火，认为既未取得我的同意，又未说明原因，竟将“政府”直属电台报务员逮捕，是对我的藐视，是侵犯“政府”职权。我当时就把总务顾问中岛万藏和最高顾问的秘书和佐良之助请来，叫他们立刻去和日本宪兵队江草队长交涉，把葛、陈二人放回。中岛与和佐应付我说：“现在时间已晚，城门业已上锁，恐怕叫不开城门。”我驳他们说：“你们别瞎说了，你们还叫不开城门？显见这是托辞，你们如果不愿去，我就亲身去办交涉。你们如去，我就在办公室这里等着，等把葛、陈二人放回，我才离开这里去休息。”中岛与和佐二人见我持之甚坚，又怕我亲身出马去交涉，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他们二人就答应着去了。两个小时工夫，就把葛、陈二人用汽车送回来，中岛与和佐也坐汽车回来

向我复命。我没再问是怎么交涉放回的，为什么把葛、陈二人逮捕，反正放出来就算完事。

三、有一次，因为预算问题和宇山兵士发生了“冲突”。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日本人一律是顾问和辅佐官，不充任正式官吏。我还妄想不叫日本人掌握实权，特别不叫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人事处长乌勒吉图曾和我说：“人事顾问（忘其名）要求看公文，并说他是人事顾问，连关于人事的公文都看着，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最高顾问要问他，他如何答复呢？”我说：“还是不叫他看好，他看了就要盖章，无形中便成为制度了，不能开此先例。”我对人事权虽然抓得很紧，但自宇山兵士来任最高顾问后，在一个时期内，虽对人事不加过问，却极力抓财政权。日本顾问部先作出了预算指标，强令各部接受，伪民政部经费要的多，而预算指标列的少，特克希卜彦极力争要，我也坚持非多给不可。宇山兵士却斥责民政顾问岸川兼辅无能，不能掌握民政部事务，责成他非按着预算指标通过不可，因此闹成僵局。我听到后也很生气，就把宇山兵士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我质问他：“蒙古联盟政府的事情，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要是我当家，我就有最后决定权；要是你当家，我就回旗去。”宇山兵士说：“你是主席兼政务院长，我是你的顾问，当然是你当家。”我又说：“那么，为什么我主张列入的教育经费就不算数呢？”宇山兵士说：“这件事好办，容我和有关顾问们商量商量。”结果重新列入蒙人教育复兴费十万元，我也再未说什么，这场争执就这样作了结束。从此宇山兵士改变了做法，对我极力敷衍，并要深入各盟视察，表示愿意“辅佐”我好好地干一场。我也给各盟打电报，说宇山兵士是很好的顾问，叫各盟旗准备欢迎他。有一次，我和他及其他顾问在蒙古会馆聚餐，我表示不同意“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和该会的做法。宇山兵士说：“‘蒙疆联合

委员会’的做法我们可以不管它，不是还有联盟政府吗？我们只要把联盟政府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并表示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把旧绥远省立工科学校的机器拆走做了兵营等等做法是不妥当的，说这对于收揽人心有影响。不意宇山兵士说过这些话之后，没几天就被调走，由伪畜产部顾问泉名英（系日本退役少将）升任最高顾问。据我推测，宇山被调走的原因，是他对我有迁就的倾向，这就不符合日本军部的高压政策。他表示不应把学校作为兵营或旅馆，显系对日本军部的批评。这些事被日本军部知道了当然对他不满意，所以很快地就把他调走了。

四、在扣捕色林保问题上，我和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冲突”。色林保原系西公旗的协理兼保商团长，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因为西公旗争夺札萨克职位问题，他和石拉布多尔济（石王）结成一党，以绥远当局为靠山，与“蒙政会”对立。迨至日“蒙”军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权后，色林保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对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日本特务机关则因他在西公旗掌握一部分武力，可供利用，对他极力拉拢袒护。色林保每到“厚和”就住在特务机关，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使我甚为恼火。为此我就命令伪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到日本特务机关去要色林保，想加以制裁。卓里克图前去交涉，不想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岩崎竟为色林保保镖，抗不交出。嗣又经中岛万藏出面，向特务机关说明色林保在西公旗事件中的情况，特务机关方面才了解色林保过去与“蒙政会”搞过对立，并考虑到：为了袒护一个色林保，惹起我这个“主席”的不满，很不适当，于是卓里克图又去交涉时，便提出条件说：“可以将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但要顾全特务机关的面子，不要到特务机关扣捕，要在别的地方设法诱捕。”有一天，色林保为了拉拢日“蒙”军政人员，企图展开政治活

动，在凤林阁饭庄请客，中岛万藏和卓里克图均在受邀之列。卓里克图得到这个机会，便预先布置下军警，待到宴会开始后，把岩崎悄悄请出来，说明要进行扣逮色林保的布置，要求岩崎最好把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否则就指挥军警进行扣逮。岩崎初则不肯，只管摇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卓里克图的要求，亲乘汽车把色林保送来，我即交由卓里克图送到监狱，关押约近两个月。然后由我旗（西苏尼特旗）派来保安人员，将色林保带至我旗监管，后因病死在我旗。

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到伪联合自治政府

我和日本方面最大的“冲突”是关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设立问题。在蒙古（即伪蒙古联盟政府）、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相继成立后，行政上虽不相隶属，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控制这三个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搜刮战略物资，就在日本军部操纵下，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特由伪满调来金井章二主持筹备成立事宜。并通知三个伪政权，各派代表“缔结协定”。由“察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于品卿、杜运宇二人，由“晋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夏恭、马永魁二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代表，日本方面内定为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三人。

这次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指使下，通过三个伪“自治政府”代表“协商”的形式，于 1937 年 11 月 22 日缔结伪协定如次：

一、本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关于各政权有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

门委员会，与必要之职员构成之。

三、总务委员长总理并代表联合委员会。

四、联合委员会置日本顾问一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

五、联合委员会之决议，须经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

六、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命令，须以联合委员会名义行之。各政权为了援助易于执行，得分担义务。

七、联合委员会得管理各政权委托之公有财产。

八、非经各政权之同意，委员不得脱会。

九、本协定用日文、蒙文、汉文作条文，如有疑义，依据日文解释之。

缔结协定后，即正式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本军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任命村谷彦治郎为参议，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杜运宇、马永魁等为委员，分管总务、产业、金融、交通等事项。

到了 1938 年 8 月 1 日，在金井章二的操纵下，通过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决定实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由卓特巴札普任总务部长，派野田武为总务顾问；由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派高津彦次、森田清为产业顾问；由马永魁任财政部长，派寺崎英雄、久间猛为财政顾问；由陶克陶任保安部长，派伊藤祐为保安顾问；由杜运宇任交通部长兼民生部长，派满尾君祐、赤板亮一分任交通和民生顾问。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是由协商性质的结构，变成行政组织；其扩大组织的范围，是由代管产业、金融、交通扩大到管理民政和保安，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大

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

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记得陶克陶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返回“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我们几个人闲谈时，竟洋洋得意地说：“我是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是管你们的。”我都毫不介意，还认为他不敢藐视我，因为他虽是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但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中，他是总务厅长，我是主席兼政务院长，仍是管他的。他说这话不过是对在坐的其他人员表示得意而已。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1938年秋，日本军部决定，令金井章二陪我和于品卿、夏恭、李守信等“访日”，日程业已作了安排。我这时正在锡盟巡视，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到达张家口，日本军部的政治参谋大桥雄熊很着急，就责令陶克陶催我火速前来。陶克陶竟发牢骚说：“在这紧急的时候，德王却回到锡盟巡视不来，把他杀了算啦。”（这话是李守信告诉我的）这说明陶克陶已经不为我用，完全站在日本军部方面去了。

我到了张家口便起程，经北平、山海关、奉天（即沈阳）、朝鲜等地，渡海到达日本下关车站。我对日本国内欢迎人员“致辞”时，总是说“蒙古”，不说“蒙疆”。我讲完话后，我的随身翻译吉尔嘎朗译成日语。金井章二在旁边，马上向新闻记者和欢迎人员解释说，方才德王所说的“蒙古”就是“蒙疆”，使我很感不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招待我等一行宴会，宴前我和近卫周旋闲谈说：“现在蒙古民众都不愿意‘蒙疆’这个名称，仍愿意用蒙古代表新的政权。”正在说这话时，招待人员给近卫送来“挨拶子辞”（系应酬致辞之意），近卫看过之后，见上面所

有“蒙古”二字都换成了“蒙疆”，因我方才说过反对“蒙疆”之言，近卫似有觉察地踌躇了一下。但近卫致辞，仍是把原稿宣读一遍，可能金井章二又预先做了工作。

这时板垣征四郎任日本内阁陆军省大臣，东条英机任陆军省次官。当他们约定和我见面时，虽然都是旧相识，因为金井在座，只说些应酬之言，未谈重要问题。见面后，板垣的亲信人员（忘其名）和正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说：“德王和板垣大臣过去就曾相识，为什么见面时没说心里话，未谈重要问题呢？其中不无原因。”吴鹤龄答复说：“会见时因有他人在座（指金井章二）不便谈吧。”这个日本人顿然领悟说：“啊！原来如此！那么，我向板垣大臣说，再约德王单独见面。”吴鹤龄将此情况具以告我，于是我就和吴鹤龄商讨“扩大蒙古政权”和“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当即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向外长城纯蒙旗地带发展，放弃内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地区，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伪蒙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起初我主张第一案，吴鹤龄极力主张第二案。并强调说：“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为什么不要呢？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话，连北平、河北都想要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我来到东京后，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和日本朝野有名人士作过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曾向他们建议，对中国实行‘分块统治’的政策。像‘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有的日本人非常赞成我的说法。”当时我感觉到，吴鹤龄的野心比我还大。但又意识到，吴鹤龄向来主张“捡到筐里就是菜”，他是特别注重现实利益的人。他所说“连河北、北平都想要”之言，不过是强调不要放弃察南、晋

北的陪衬语而已。经吴鹤龄反复陈述理由，我也觉得目前吸收察南、晋北，扩大伪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也就再未说什么。吴鹤龄便将第二案定为甲案，第一案定为乙案。当板垣再次约我见面时，即将这两个方案亲手交给板垣，并说明这两个方案的内容。板垣答复说：“俟经详密研究，再行答复。”过了几日，板垣又在陆军大臣官邸召集我们，答复关于“蒙古建国”问题。他说：“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收复’，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对蒙古的国策，希望大家相信。”这话虽然是板垣支吾其词，用以安慰我妄想“蒙古建国”和实现“大蒙古主义”的迷梦，但也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野心。等我访日返蒙后，曾接到吴鹤龄的来信，说是板垣同意甲案，并由陆军省通知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实行。

金井章二见我到处仍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当然非常不满。他认为“蒙疆”这个名称，是日本军部和他金井章二主张应用的，非在日本国内展开宣传使人周知不可。当我“访日”行将结束，东京放送局约我向日本全国广播时，金井章二认为这是强制我把“蒙古”改说成“蒙疆”的好机会。他虽未对我直接警告，却派人对吉尔嘎朗恫吓说：“德王在日本，不许再说‘蒙古’，不许再说‘建国’。他如果再这样说，你也不许给他译成日语，要把‘蒙古’二字一律改称‘蒙疆’。如果你不这样办，要小心你的脑袋！”这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前来看我，听到金井所派人员恫吓吉尔嘎朗之言，也很气愤地说：“日本人真厉害，连‘蒙古’二字都不叫说，还能谈到其他吗！”但我在广播中还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我在“访日”期间，也曾见过日本天皇，我说的是“感谢日本的援助”，他说的是希望“协力维护东亚和平事业”。都是应酬之语，没有

谈到实际问题。

我“访日”回蒙途中，想到金井章二在日本东京控制我只许说“蒙疆”、不许说“蒙古”，不许说“建国”的种种说法，有很大的反感，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总觉得，“蒙古”与“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义问题，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二字不仅代表民族，并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起“蒙古”二字，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中国的地方政权。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时期，我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作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块金字招牌。迨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又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建国”，作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个幌子。用这“蒙古”二字，笼络不少的青年为我所用，可以说是我的“得意杰作”，是我在政治舞台上有用的幌子。而在“访日”时期，却连“蒙古”二字都不能说了，今后将何以号召蒙人，言念及此，不胜烦恼。

我等一行回到张家口后，适逢举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约我前往参加。我开始托故不去，金井章二很着急。因为这时日本北支（华北）派遣军的参谋长（忘其名）、伪满代表等很多来宾都来参加祝贺，我如不参加，显见其中有了裂痕，对日本方面所宣传的“日蒙亲善、密切合作”是个讽刺。金井特又连次派人前来劝我参加。我在大家一再相劝之下，才勉强地迟迟前往。我到典礼会场时，所有参加人员和来宾均已先行在座等候，我到后才开始举行典礼。我并没有讲话。

我由张家口回到“厚和豪特”后，前来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的各盟盟长、各旗札萨克、总管等，因为等我回来听取“访日”的情形，尚未返任。我就召集他们开

会，提出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大家均表同意，并经决定由各盟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六份，备我使用。各盟旗首脑返回后，即陆续送来，就是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由阿王设法弄到盖有印鉴的空白公文。惟有察盟盟长明安旗总管卓特巴札普送来的印文没有署他自己的名字，仅有总管代理人署名。听说他向人表示说：“我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反不动嘛！何苦来此一举。”我收到各盟旗送来的印文之后，就责成伪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的理由是：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盟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这个公文拟就后，又译成蒙、日两种文字，并把蒙文的一份，写在盖有各盟旗印鉴的公文纸上，作为主件，把日文的一份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我计划寄给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本部、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各一份，自留一份。即将付邮时，旋又考虑到直接向日本国内首相等寄送，不大妥当，结果仅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一份，嘱他相机办理。适在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向陶克陶的秘书张锦堂密探此事，并表示愿出重资购买该项公文稿件。陶克陶忙来和我说：“你联合各盟旗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之事，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曾向张锦堂询问并要出资购买公文稿件，怎么办呢？”我答复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正要把这反对的公文送给日本军部，他们既要出资购买稿件，告诉张锦堂可以卖给他们，赚他们一笔钱。”张锦堂得到我的许可后，就将公文底稿抄了一份交出去，听说仅给报酬 50 元。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握我们内部情况，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待我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送交日本军部后，日

本军部便通知我到张家口去商量事情。我到张家口后，大桥雄熊前来看我，我便谈到不同意用“蒙疆”二字作为机关名称问题，并提出反对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措施。大桥雄熊说：“现在预定请你当总务委员长，所有一切事情，你都交给我们吧。”翌日，莲沼兵团司令官又约我相见说：“关于‘蒙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你何必发动各盟旗联合反对呢？”我把反对“蒙疆”公文的内容，又向他作了说明，并强调这是各盟旗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莲沼也表示请我当“总务委员长”。我和莲沼会谈后，大桥雄熊又约我到另一会客室里，向我解释：“‘蒙疆’二字，有今昔之不同。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时期，应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压迫你们，今日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日本帮助你们建立新的政权。”我仍是坚持我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和莲沼、大桥会谈后，经反复考虑，认为日本军部是想用让我当“总务委员长”的方法，封住我的口，不再反对“蒙疆”。我为了不在各盟旗中留下只顾个人升官的口实，于是又调动人马，通知各盟选派代表，到张家口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田中信一参谋，反对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伪蒙古政权的名称，并说明我不就“总务委员长”的理由，嘱咐陶克陶作他们的翻译，务要把盟旗代表的意见表达出来。谁想陶克陶自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早已倒向日本军部方面。并因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的态度蛮横，说话强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表人物，陶克陶只有顺从其意，不敢作丝毫的折冲，不但对于盟旗代表们所说的话，没有完全翻译出来，还有可能从中捣鬼。金井章二也对“蒙疆”二字任意曲解，说“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

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因而各盟旗代表林沁旺都特等，到张家口进行反对“蒙疆”问题的活动，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目的。

我虽因为策动各盟旗反对“蒙疆”，招致日本军部的不满，但这时他们还须利用我这块招牌，统治内蒙古地区，因而又授意陶克陶劝我就任“总务委员长”。陶克陶深恐自己劝不动，特把李守信搬出来，一同前来劝我说：“现在金井已表示愿意辞去代理总务委员长一职，请你前往就任，如果仍然表示不就，恐怕影响不大好。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吗？现在日本军部方面已经说好了，还是到张家口去就任吧。”这时我也考虑到，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样决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也只好就任了。因而就向李、陶二人表示说：“就任就就任吧。”但我以为，就任仪式可能要通过推选形式，不意我到张家口后，陶克陶早和日本方面作成圈套来捉弄我。

1939年4月29日晨，陶克陶特来请我到日本军部“商量要事”。我到后，大桥雄熊就迎出来和我说：“现在就举行任命式。”金井章二等先已在座，莲沼兵团司令官在几个人当中严肃地站着，田中信一参谋长陪侍一旁，大桥雄熊就宣布任命式开始。首先由金井章二表示，辞卸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继由莲沼宣布，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当时我虽知道受了欺骗和玩弄，心中充满了苦恼，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只好接受任命，没有表示不就。这就显露了我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奴隶性。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后，莲沼又以司令官名义，给我赏金一万元，我也就接过来。我返寓后，认为今天举行任命式，事先既不和我商量，临时又不叫我知道，诿我到了日本军部后，就突然来了一个任命式。把我玩弄到了这个地步，越想越难过，就拿起威士忌酒来喝，一气喝了几碗，喝得东倒西歪，醺醺大醉。这时陶克陶前来

见我，我一看见他，不由得无名火起，把怒气完全泄在他的身上，猛然打了他一拳，并严辞责斥说：“今日举行任命式，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谈，反和日本军部作成圈套，来欺骗玩弄我！”陶克陶推说事先不知道，就抓个空隙溜走了。

嗣后，我把被任命为总务委员长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吴鹤龄，嘱他向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反映。不久，接到吴鹤龄复信，说板垣表示，日本军部这个做法不对，不应采取任命的方法，惹得德王不愿意。我认为板垣还“同情”我，因而胆子又壮起来。有一次，在张家口又和大桥雄熊见面，我根据“访日”时给板垣的甲、乙两案的内容，谈到扩大和强化伪蒙政权及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大桥面带狞笑而用嘲弄的口吻说：“你们蒙古独立得啦。”我猛然听到他的话还很惊讶，怎么他也说出允许“蒙古独立”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军撤退好了。”结果又是弄得不欢而散。

我返寓后，回味大桥所说的话，是给我软中有硬的钉子碰，是对我的藐视和嘲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恶，再不能“合作”下去，便打算出走。那么究竟向何处去呢？左思右想，既不愿走向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蒋介石。因而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段关系。因为这是后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准备在写《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一文中，再作详细的叙述。

我既然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过问了，更不争执了，日本方面说啥就是啥。“被休的媳妇，不管牛犊隔奶”这句蒙古族谚语，很能表达我当时的消极心情。例如，这时日本方面提出，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的“蒙疆政权”，

并主张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有的旗号，另制新的政权旗号。这本来是我不同意的。我的主张一直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撤销“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厚和浩特”成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并主张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原有旗号，不另制定新的政权旗号。这两个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应当争执。只因我这时一心想要出走，不惟没有力争，反顺从日本军部的意旨，于1939年6月11日和于品卿、夏恭等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我们三个“自治政府”愿意合流，成立统一的新政权。结果就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操纵下，于是年9月1日实行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把“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虽然降为地方政权，仍保持原来机构。仅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裁撤，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接统辖锡、察、巴、乌、伊五盟，并将“厚和”市划归巴盟管辖，把包头市划归伊盟管辖。至此，不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寿终正寝，连我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帝国”的迷梦，眼看也将破灭了。

（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主席）